

文坛琐忆

萧斌如 著



遠東出版社

琐忆



萧斌如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翰墨缘：文坛琐忆/萧斌如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476 - 0757 - 2

I. ①翰… II. ①萧…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890 号

策 划：黄政一
责任编辑：黄政一
封面设计：张晶灵

翰墨缘——文坛琐忆

著者：萧斌如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151 千字

印张：9.25 插页 5

印数：1—1500

ISBN 978 - 7 - 5476 - 0757 - 2/G · 551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 - 62347733 - 8538

八十自序

萧斌如

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在淮海中路落成，其时我正面临退休之年，但因工作需要，继续留在原来岗位上发挥余热，达7年之久。直到2003年我年届古稀，终于可以回家歇歇养老了。但心中还有那么多难忘的人和事，使我耿耿于怀、欲罢不能。于是我抱着一种“退而不休”的精神，与往常一样地工作着，不同的是我已成为一个自由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若有人找我帮忙，我也心甘情愿助人。生活上我有一种诸事随缘的心态，任凭别人说三道四，我总忘不了那一份“缘分”。

有一次，我从《新民晚报》上见漫画家郑辛遥一幅漫画中提到：“成功靠四人：高人指点，贵人相助，旁人找茬，个人奋斗。”细细回忆我的一生，在平凡的工作中都很幸运地遇到这四种人，令我终身受益。书缘、人缘造就了我平凡生活的丰富多彩。

有人说，一个人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各人经历不同，但都要付诸辛勤劳动，所得的财富来之不易，所以我非常珍惜！

2002年上海图书馆建馆50年之际，我的一本《与文化名人同行》有幸被馆里列入计划。我在书中撰写了夏衍、巴金、冰心、萧乾、施蛰存、赵家璧、顾廷龙、贾植芳、戈宝权、范泉、钱君匋、关山月、黄苗子、丁聪等10余人，讲述与他们交往中的故事。虽是薄薄一本，但由黄苗子题写书名，丁聪为我画了肖像，贾植芳和杜宣分别为本书写了序。贾先生在序文中说：“眼下这部新著应该是她积年累月收集、整理、鉴别与编辑的众多文献性和史料性的专著的副产品，也可以说是她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图书馆学者的治学的总结或纪念。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它们不仅具有文献史料价值，作为文史小品，也很值得阅读欣赏，并耐人寻味……。那就算我为萧斌如女士三十多年学术与友情交往的一个纪念吧。”

杜宣老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工作没有什么平凡和高贵，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那就是高贵。”他还为我书写了一副对联：“一生求理达，半世为书忙。”

我知道这是两位前辈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尤其是许多人看了这本小书，都纷纷赞扬我的努力，半个世纪身在图书馆没有浪费时间，用自己一生勤奋努力，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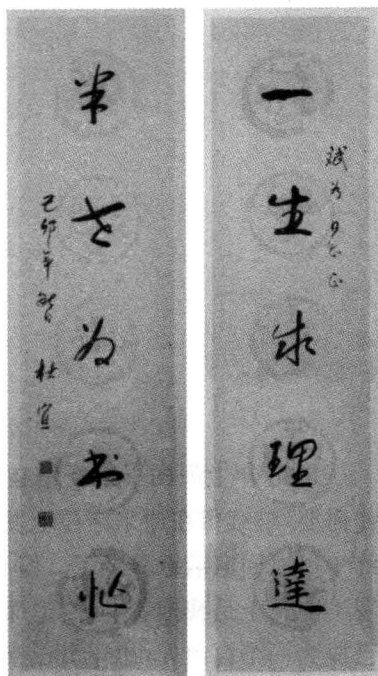
后来，我能专心致志地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是退休这几年。我的家从市区迁入郊区，这里环境幽静，房屋宽敞，我感到最称心如意的是有了独立的书房，使我能将历年来所藏的书，一一列在书柜里，其中不乏众多名家的签名本。更欣喜的是著名画家关山月为我的书房题名为“书缘斋”，而老作家杜宣则题名为“醉书斋”。回顾我与书相伴的一生，

由书缘结下了人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正如两位前辈题写的斋名，如同人生坐标，一横一纵，涵盖了我一生的追求。“书缘”浓缩了人和书的缘分，以及由书为缘发生的人和人之间的故事，书与缘是我生命中最为自豪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学历不高，却并不轻视自己。我知道自己并不笨，无论在念小学、中学时，老师都夸我聪明，但不够努力，直到工作后，才后悔莫及。生活教育了我，工作有苦乐，只有尝过苦的滋味，才能知道乐的甜味。

我的书房中挂着一幅老馆长顾廷龙先生以篆体题写的“勤能补拙”条幅。他对我说：“勤是指主观上不懈努力，凡事尽力多做或不断地去做，只有勤奋努力才能弥补不足之处。”顾老这件墨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其实，人们有所不知，在我事业最艰难的时刻，是顾老拯救了我。上世纪70年代，我负责编辑《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一书。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编辑大型综合性丛书目录，况且这类丛书的目录，过去无人涉及，我又缺乏经验，也颇感棘手。刚起步，就遇到种种压力，甚至来自上级领导的严厉指责。这气势有望你立即下马，让“熟悉”业务的得力干将来干。当时我面对这种汹汹来势，不仅没被吓



杜宣为笔者书写的“一生求理达，半世为书忙”

倒,相反鼓起勇气,大胆地列举一些丛书,并一一道出其中丛书子目难以归类等问题,而他们听后也无言回答。这天,顾老一直静静地坐着,没说一句话,也使在座的人们感到纳闷。这次会议也就不了了之。事后,顾老鼓励我说:“图书馆就是要编制书目,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哪怕最终是一本账册也好,至少可以为读者、研究者提供检索方便。同时通过编目,对你在业务上肯定大有收益,希望你努力,有困难我会帮助解决的。”顾老的谆谆教诲,使我热泪盈眶。我瞬间感悟到那天他为什么没有在会上发言,这就是表明他的态度。

当《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编成后,顾老又亲自致函上级领导,并为出版奔走呼吁,还鼓励我多作媒体宣传,一再嘱咐介绍文章要写得简要些,语气要谦虚些,以扩大影响。后来我在《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介绍文章,都是经顾老审阅修改过的。从此,在顾老指导下,我陆续撰写了一些介绍丛书的文章,如《毛泽东与〈国民运动丛书〉》、《恽代英与〈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王任叔与〈公论丛书〉》,以及《〈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怎样编成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及其丛书》等,在报刊上发表后,颇有影响。尤其出乎意料的是,上面提到的“上级领导”,就是当时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同志,这次在整理书信中,偶然发现方行同志1989年给我的一封信:“大作已拜读(指《〈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及其丛书》一文),深感写得好,顺便提几点意见,供你参考。”他在信中列举了有关苏区、边区,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等出版的丛书等。他在信件最后说:“此均偶然所及恕难具体,如有不当,作为姑妄言之可耳。”见此信,十几年前的一幕幕情景又重现眼前,这位局长如此关心我,我倒真的要感谢他。在这里我要感谢恩师顾廷龙先生,在我几乎要倒下去时,是他这棵大树背后默默地支撑着我,他的循循诱导,使我抛弃一切杂念,专心致至,勤奋工作。可以说,是顾老这位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虽一路走下来很艰辛,但他始终一如既往地呵护着我,他是我一生的福星,永生难忘!

2009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该书与前一本《与文化名人同行》相比有较大篇幅增加,共收入郭沫若、茅盾、曹禺、姚雪垠、赵朴初、华君武、爱泼斯坦等50余位与上海结下的浓重文化情缘的文化名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道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逸事。

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在序文中大为赞赏,他称我为“文史专家”,我受之有愧,我仅仅是一名图书馆工作者,做了自己份内的事而已。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从南到北走访文化老人,那时我一无头衔,又无名片,可老人们从不问我的职务,却都会问我是什么大学毕业的?何时进上海图书馆的?我都坦诚相

告，自己没有上过大学。1952年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偶然机遇考进了上海图书馆。他们听了都笑道：“原来你是‘图书馆大学’的元老，你太幸福了。”而周而复更亲切地说：“我读书、写作利用图书馆，行路、考察参观图书馆，图书馆是一所没有教授的庞大得无所不包的高等学府，我们都是高等学府里的一名学生，你却一辈子在高等学府读书，真为你骄傲。”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说道：“三十年代我来北京求学，而所谓上学就是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的书库是可以随便翻阅的。入书库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矣！我很羡慕你一生就读于图书馆这座大学，这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座金矿啊！多少名人、学者，几乎都是以图书馆作为依托而取得成绩的。当然，我也不能例外。祝你事业有成。”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学术泰斗，只是小学毕业，他的一切一切都是他自学的，令我肃然起敬。从他们对图书馆难以割舍的情结，我深深感悟到自己一辈子不就是在这座“图书馆大学”读书么。我情不自禁地说：“那么，我就是‘图书馆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过去怎么没有想到这是我的福分，也是我一生最值得欣慰的。

去年是上海图书馆建馆60周年纪念，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有很多感慨。当年的小丫头，如今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了。确实在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间，它给我带来了无数智慧，无数良师，无数回忆。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施人慎勿念，受施慎毋忘。我从心底里感恩这座“图书馆大学”丰富了我的人生，留给我的知识财富，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今年正逢我80虚岁，老来才真正知道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更加珍惜今天的时间。要用有限的时光，坚持把一些没有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催着我。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百余件大家的信函，其中最多者有30余封，每当我一件件翻阅，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字里行间渗透着亲人般的温馨都历历在目，瞬间我的眼泪会流下来。这种印象很鲜明地储存在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了。

过去曾想出一本书信集，但最后决定将这批书信遴选一遍，每一个人选一二件，并叙述人和书信的友谊，书名为《翰墨缘——文坛琐忆》。我想这是第一本，以后还会继续写下去。故先入选18人，如今健在的有96岁高龄的曾敏之、百岁女作家罗洪。已作古的有雷洁琼、柯灵、王元化、施蛰存、赵家璧、吴祖光、王仰晨等。从这些书信切入，一一道出书信背后的点滴故事。

有人说：“老人的财富是回忆。把过去的事如实道出来，这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我有同感，说实在，人老了还图什么呢？只有保持一个良好的

心态，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把一切事物看清看淡，知足才会健康快乐。钱君匋先生赠我一副对联：“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精辟之句、涵义深刻，这对我们人生不就是最好的启示吗？

在此，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政一同志，如果没有他的热忱相助，本书也难以出版。感谢陈燮君老师在百忙之中，特为老友 80 岁作油画一幅题名为《大山的风骨》，并赠“寿比南山”墨宝一副。还有 60 年友谊的恩泽兄，如今他已 87 岁高寿，他是我们同行中的楷模，能文能武，擅长书法，特赠墨宝：“乐在书中”一幅贺寿。在此我也由衷地向他们致谢！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这篇“序”文，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也许人老了对往事常常耿耿于怀，总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这大概是老人的通病吧！务请各位谅解。

2013 年春于书缘斋

目 录

戈宝权	1
朱雯与罗洪	8
贾植芳	21
柯灵	28
雷洁琼	34
钱君匋	44
曾敏之	50
施蛰存	58
王仰晨	67
王元化	75
吴祖光与新凤霞	83
萧 乾	90
赵家璧	95
赵清阁	101
周而复	109
丁聪为我画肖像	116

关山月的“福痣”	118
怀念胡道静先生	120
附文：我的父亲萧文康	129

戈宝权

戈宝权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同时还是一位藏书家。他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藏书。戈宝权先生常对人们说：“我们家与上海，与上海图书馆有缘。”生于江苏东台一书香门第的戈宝权，在 1928 年入上海的大夏大学主修英语，选修法语并旁听日语，后又自学了俄语。他于 1935 年 22 岁时，作为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驻苏联。30 年代苏联政府曾邀请梅兰芳剧团访苏，戈宝权随团采访。当时莫斯科广场举行大检阅，他有幸见到了高尔基和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夫妇，并为国内众多报刊采写了数以百计的“苏联通讯”。而早在 50 年代，因研究中国翻译书，戈宝权每次都要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从故纸堆里查阅有关报刊资料。另一个因缘是他的叔父戈公振（1880—1935）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他曾因编写



1991 年 1 月 13 日南京戈宝权先生寓所留影



1996年3月6日病中的戈宝权与夫人梁培兰和笔者合影

《中国报学史》一书，当年长期在徐家汇天主教堂的藏书楼（即现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查阅资料，并与主持徐宗泽修士结下了深厚友谊，故而 1958 年戈宝权将其叔父戈公振所有图书、报刊资料全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我与戈宝权先生相识于 1979 年 6 月在四川乐山举行的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盛会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 97 个单位的学术研究者、高等院校教师、文化新闻工作者 130 余人。其中有文化界前辈楼适夷、吴伯箫、艾芜、马识途、戈宝权等。在分组讨论时，我被分在戈宝权一组，戈老是召集人。小组会上要作自我介绍，当他得知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似乎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他亲切地问我何时进图书馆的？我回答 1952 年上海图书馆开馆时就在。他说很遗憾，我曾多次去上海图书馆寻找资料，而未能见到你，今天我们是有缘相识了。在三天的小组会上进行交流，我的论文是关于编辑郭沫若《著译书目》及《系年目录》，指出郭沫若著译中出现众多同书异名以及盗版书、伪托本和有关稀罕珍本，都一一列举。当我谈到“伪托本”如《黄金似的童年》，1932 年 4 月上海新文艺书店出版，苏联爱伦堡等著，题郭沫若译，但经与曹靖华译的《烟袋》一比较，全书章节内容全部相同，显系改换书名伪托郭沫若译。还有《草枕》，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草枕》（日本夏目漱石著）的译者是郭沫若。但我们馆藏有三种译本——益智书店题李君猛译、上海真善美书店题崔万秋译、上海丽华书店题郭沫若译。经再三核对，发现“丽华”版与“真善美”版两书内容完全相同，最后分析得出结论是崔万秋译，而“丽华”是借郭沫若之盛名而出的伪托本。当时，戈老听了大为惊讶地

说：“我一直以为《草枕》是郭沫若译的，由于你们研究工作的细致，纠正了我的错误。”他深表感谢，并推荐我大会发言，并将论文打印稿发给每位代表。大会发言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人楼适夷上前与我握手，说：“感谢你为郭沫若研究作了一件大好事，感谢上海图书馆为郭沫若研究作了‘开路先锋’”。会议结束后，我向戈宝权先生辞行，他又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图书馆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希望你充分利用丰富馆藏，多读点书。我的学问也是从图书馆里学的，图书馆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希望你将来在文学园地里多作贡献。

从那时起我与戈宝权先生时有书信或面谊之交。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79年冬的一个晚上，他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到我淮海路的家。一位著名学者光临寒舍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沏茶让座后，得知他这次来上海主要是为写一篇纪念文章，去徐家汇藏书楼查阅戈公振的图书和他主编的《时报》等资料。因所住的妹妹家离我家近，故顺便来看望的。我连忙说：“不敢当，你的到来，真使我受宠若惊。”他却说：“我和你一样的人，只不过年龄比你大一点而已。”那天他还很关心我的工作，嘱我好好利用图书馆这一阵地，多看些文学名著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年幼时，叔父戈公振曾送他一盒积木玩具，并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尽管这盒积木早在童年时就散失了，但叔父写的两句话，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我理解戈老的用意，身处书海中，我更要充分利用，多读点书，才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1980年我乘出差北京之际，在东罗圈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拜访戈宝权先生，登上四楼，按了门铃，先生开门欢迎。当时印象房内显得有点零乱，一切陈设极为普通，而且都很陈旧，但处处都是书。我随口说了一句：“戈先生您的书真多呀！”还没来得及说想进他的书房看看，他马上颇解人意接茬道：“我先请你看看我的藏书楼吧。”

出门上楼，这是一间搭建的书库，约有二三十平方米，只见沿墙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排列得整整齐齐，除中间安放一张小书桌外，四周尽是书，真是一个读书人的乐园！我昂头看看书架上的那些书籍，极大部分是外文书，尤其是俄文书。以前常听人说戈宝权是个爱书成癖的人，今天亲眼所见，才知道他给自己的藏书楼定名为“万卷书斋”。据他介绍，这些藏书中除俄文外，还有英、法、乌克兰、波、捷、匈、保以及日本等版本。最珍贵的是他几十年来精心搜集的一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上海图书馆

萧飒如旧友：

您好！

我刚从香港、新加坡、曼谷和河内归来，看到“信号”杂志的信和照片，谢谢！

从来信中知道您在从事，经营中国主题的私人书局，满载而归。您办得真高！我有许多书和手稿，在现在和过去的时间里，或许能卖个好价钱。一九八八年我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语言的书，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文学的书。我准备在下次出版时，同书出版商协商一下。我的书稿加一册。我想给您写信“中国主题的私人书局”，但篇幅太长，人太南方，书和手稿及照片，一纸书写的语言，不回来。从信中知道您是南京半山园五号7-2，电话是40.3888。

希望一八八二年前之出版商能早日出版此书。此书以中国语言为题材，内容非常丰富，值得出版。期待您的来信，并祝您健康，万事如意！

X 签名，梁培基

(1991年12月28日)

俄文版的《托尔斯泰全集》，这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出版，直到1957年才终于出齐的一项大“工程”，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能配齐。当时我很天真地问了一连串问题，这么多的书，而且文字种类又广，你怎么看得过来呀？书架那么高，你又如何取书呢？——他得意地笑着指指旁边一架梯子说：“这就是我的工具，可以爬上去取我所需要的书籍。”随即顺手拿过梯子，要“表演”给我看，我急忙上前劝阻。他却满不在乎地宽慰我：“你不要紧张，我每天要上梯取书好几回呢！已经习惯了。”可我想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要登梯爬上爬下怎不叫人担心呀！

说起戈老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他也会不由得想起叔父这位启蒙老师。记得他10岁时，收到叔父从上海寄来的一套翻译本《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正是这套书，使他最初接触到俄国文学，而且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呢！这正为他打开了一扇面向外国文学的窗户。

那天，戈老对我推心置腹地谈了他在“文革”中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下放去图书馆管理图书。他说：“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广阔无比，一辈子用不完。在国外，图书馆工作者是有一定地位的，读者一进图书馆的门，馆员便很有礼貌地认为你是为照顾他们而来的，态度十分诚恳。他又谈到图书馆的目录体系，认为目录体系很重要，对研究人员有很大帮助。”

那天从戈老家出来，走在路上仿佛还在他的“藏书楼”里，听他的教诲，真是回味无穷！

我们知道戈宝权一生爱书如命，而他在1986年却毅然决定将家中珍藏的图书全部捐赠南京图书馆和他的家乡东台市。后得知书运到南京图书馆，发现其中有许多作者签名本，中国的有郭沫若、巴金、曹禺、艾青、曹靖华、茅盾、老舍等；外国的有法捷耶夫、爱伦堡、乌兰诺娃、西蒙诺夫等，共有2万余册。如今这些中外作家都已作古，这些亲笔签名的著述则愈显珍贵了，有人说，这可算是新善本了。

此后不久，南京图书馆为戈老的赠书特辟“戈宝权藏书室”，室名为钱君匋以篆文所书。藏书票为丁聪画，黄苗子写，高莽为藏书室画像，题字为顾廷龙所作。该馆特聘戈宝权为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而他的家乡东台市建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市立图书馆。江苏省发给他老人家一笔奖金，戈老将这些钱转交给译林出版社，设立了“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基金，这是中国第一项以个人命名的翻译奖。

1991年12月18日戈宝权先生来信中说：“从来信中知道你在北京征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满载而归，很为你高兴！我多年来的手稿，在排印后都没有收回，现承你来信征集我的手稿，1988年我翻译乌克兰伟大诗人《谢甫琴科诗集》时，发

萧张如同志：

你好！

我刚从香港、新加坡讲学和访问归来，看到你寄来的信和照片，谢谢！

从来信中知道你到北京，征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满载而归。很为你馆高兴！我当年写的年稿，在排后都没有收回，靠你来信征集我的年稿，一九八八年我根据乌克兰裔翻译乌克兰伟大人民诗人《谢甫琴科诗集》时，现译稿重抄的，因此我的手稿得以保存下来。现时年稿可以整理，捐赠给你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收藏。望有便人去南京时，将手稿及我译的《谢甫琴科诗集》取回。我家的地址是南京后半山园五号，一、二，电话是南京 40-3888。

一九九二年的元旦和新春佳节即将来到之时，谨向你和你馆诸位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愉快，万事如意！

戈宝权 梁培兰附笔

1991年12月28日

排稿子是重抄的，因此我的手稿得以保存下来。现将手稿加以整理捐赠你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藏。”

戈宝权翻译的中文版《谢甫琴科诗集》出版时，在编校后记《我和谢甫琴科的关系及怎样翻译“科布扎歌手”》一文中说：“在今天谢甫琴科的光辉名字不仅在乌克兰——就是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心中，都应得到应有的尊敬和热爱。”出于这种尊敬和热爱，他把谢甫琴科的重要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如今这部诗稿已展示在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内，睹物思人，仿佛戈老亲切的声音又萦绕在我的耳边。他给我精神和学识上的帮助，是我永远受用不尽的。

戈宝权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郑兴丽是位歌唱家，育有一女。第二位夫人沙利娜，后在高校任教，育有一子。第三位夫人梁培兰，会计师，是在“文革”患难中与戈宝权相爱于1972年结合。她可是戈宝权后半生的贤内助，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在戈宝权逝世后的2001年她又将戈宝权生前用的一批工具书及参考书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她更顽强地承担起整理、编辑《戈宝权画册》和《戈宝权纪念文集》、《戈宝权全集》等。

戈宝权先生离开我们已10多年了，然而他的辉煌的业绩，他的高尚的人格，他的恢弘的大师风范，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